



乔全生 著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中华书局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乔全生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乔全生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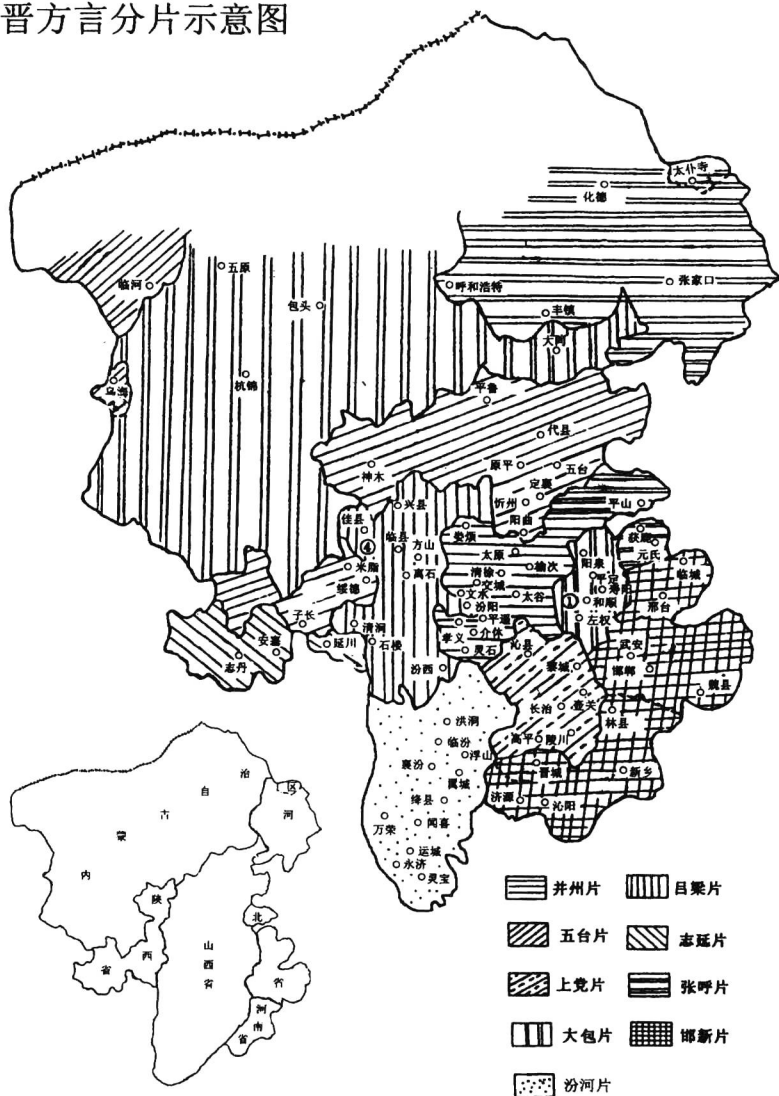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101 - 06164 - 2

I. 晋… II. 乔… III. 西北方言 - 语音 - 语言史 - 山西省 IV.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991 号

-
- | | |
|------|--|
| 书 名 |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
| 著 者 | 乔全生 |
| 责任编辑 | 王 勉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¼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 印 数 | 1 - 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164 - 2 |
| 定 价 | 30.00 元 |
-

晋方言分片示意图



序

侯精一

2000年全生出版《晋方言语法研究》，我曾写有一小序，如今，全生新著《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书稿已置于我的案头，我开始写这篇小序。此刻的心情颇好。原因是书稿带给我的感觉：作者的勤奋、开拓、进步及由此折射出的晋语研究乃至当代汉语方言研究的进步。

鲁国尧先生曾说过：“方言史是方言学和音韵学两个姐妹学科的交叉部分，结合部分，遗憾的是，它正是一个薄弱环节。”他在为他的学生林亦博士最近出版的《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一书写的序言里头，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林间的响箭”，称赞林书是射向这个薄弱环节的“第一只响箭”，并且期待第二支响箭的射出。全生的这本《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出版可以说就是射向这个薄弱环节的“第二支响箭”。

作“史”的研究，当代资料及历史文献的把握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晋方言语音史研究》是全生的博士论文，数年寒窗，磨得一剑，立论的基础——无论是在资料的准备还是撰写依循的原则均很到位。资料丰富，古今中外都有。历史资料，像志书、山西文人诗词用韵杂记、地方戏曲、西夏/汉两种文字注音资料几乎穷尽，前人、今人，国人、洋人之说，也均有所评述。例如，对《西儒耳目资》的代表方言的评述，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晋方音的评述均颇有见地。作者撰写遵循的原则是：只要晋方言有的语音特征尽可能溯源，对于现今晋方言目前没有发现而在本地历史文献有所记载的语音特点也

要有所记载,以利今后。这就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不乏创见,如考察晋方言古今语音演变,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晋方言与官话方言非同步发展的观点,为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区分出来提供新的依据。关于晋语从官话方言分立的讨论,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对晋语研究的深入,晋语的研究者为“分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依据。全生的晋方言与官话方言非同步发展的观点,以今溯古,以古论今,今古兼之,古今贯通。用新的视点,为晋语的“分立”提供支持,从而使学界更多地了解晋语。这是就对晋语的研究而言。晋方言与官话方言非同步发展的观点对于官话方言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由于晋语所处的比较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官话方言相比,晋语的演变明显滞后,官话方言,特别是兰银官话已经消亡的某些特点,在晋语里头还保存着。研究者可以借助晋语“激活”西北方言的某些特点。无怪乎兰银官话的研究者会有现代晋语就是兰银官话的活化石的想法。

现代晋语的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山西大学进行山西方言普查时算起,近50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研究晋语的专著、论文出版了多种,但对晋语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几近空白。究其原因,对一个方言的研究,总得由近及远,由现代到历史。方言史的研究只能是在对方言现状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因此,历史的研究总不免相对滞后。《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出版极大丰富晋语研究园地,同时表明我们的晋语的研究已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是为序。

2007岁末于北京

异军突起之著、囊括性之著

鲁国尧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李荣先生提出了“晋语”这个专门术语，并给其定了位。李荣先生《官话方言的分区》：“从上述三幅《语言区域图》看，官话区的范围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小。徽州方言和湘语、赣语陆续从官话区分出来。现在我们还要把‘晋语’从‘北方官话’分出来。”（《方言》1985 年第一期）李先生的另一文《汉语方言的分区》重申前说：“把晋语从官话分出来，江淮官话仍旧算是官话的一个区。”（《方言》1989 年第四期）自“晋语”之说出，其后拥护者有之，持不同意见者有之。1998 年底，在上海召开了一个汉语语言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发言说，“晋语”定位之争，犹如当前通行于人们生活中的官本位，争论的焦点实质在于，“晋语”是“省部级”方言，还是“厅局级”方言？主张前者的专家认为，晋语是与官话方言、吴语、闽语等平级的，如此则汉语有十大方言。后者则认为晋语跟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等同一级别，应该捺到“官话大区”的下位，那自然是“厅局级”方言了。似乎自晋语为“省部级”方言之说提出起，这种“省级”、“厅级”之争就开始了，至今未曾稍歇。

可是就在这争辩硝烟纷腾之时，山西学者乔全生却埋首于“晋语”的钻研，数载寒窗，成《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近三十万言。人，总爱联想的，我于是把晋语级别的争辩史与全生的这本书，类同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与吕叔湘、王力、高名凯之著作的出版。我也因此称全生的这本书是“异军突起之著”。

我之所以称这本书是“异军突起之著”，还有一层意义。侯精一先生曾在《现代晋语的研究》(1999)中说过：“晋语的历史研究，古晋语的研究等重要课题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而即将在 2008 年面世的这本书，书名赫然为《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这就填补了空白，这还不能算“异军突起”吗？其他“省部级”方言的历史研究确实起步比较早，论著多，成绩大，然而渊源问题的研究无不相对显得薄弱，这是“通病”。有些方言的源头，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出什么令人瞩目的高见。有些则大有争论，兹举一例：因“五胡乱华”，东晋、刘宋时代自黄河流域南逃的大批难民把北方方言带到了江淮地区，我认为这是后世的江淮官话之源，而丁邦新先生则认为这些来自北方的难民带来的语言是吴方言之祖。乔全生教授的这第一本晋语史的著作大书特书：“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接后裔，汾河片方音是宋西北方言方音的延续。”这一观点的提出难道还不是“异军突起”吗？

我拈出《过秦论》里的“囊括”二字，用在全生的《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上，称这本书为“囊括性之著”。

何以如是说？

我认为，天下文章，坚实是第一义。于方言学，是共时描写，就应该去作认真的田野调查；是历时研究，就必须去作艰苦的文献考证。如此，方能做出第一等的文字来。要探究晋方言史，不去寻觅文献、爬梳文献，岂能有成？在这里，没有徒腾口说，妄言假设的市场。全生之所以能在晋方言的领域中，独力走向历时研究，而别树一帜，就在于他遵循“历史文献考证法”。“历史文献考证法”跟“下死功夫”是等义语，意即不问⁴⁴地用生命迸发的火星去烛照那杳冥里的尘封的钻石细粒。我们翻开他的书稿，金代李俊民《庄靖集》、明代张慎言《洎水斋诗抄》、清代无名氏《新刊校正方言应用杂字》、祁隽藻《马首农言》、徐继畲《松龕全集》、董文焕《岷樵山房日记》、齐翀《三晋见闻录》，等等，试问，有几个中国的、西方的语言学家知道这些人名和书

名？遑论读这些冷书、僻书。爬梳、勾稽那点滴的语言史料，“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全生以数载之功，读了古代山西人的大量著作，读了那么多清代和民初的地方志，读了罗常培、邵荣芬、高田时雄、李范文、龚煌城等专家的有关古代的汉语与藏语、西夏语关联的专著，读了如许多的今人的方言论著……若无“囊括”，即无此书。“囊括”二字，乃全生此书光彩之所在。

我在南京，经常去书店，到北京公干，更是要跑书店。而我每次去书店，总看到若干语言学的新书，著者的大名有的我知道，更多的我不知道，书的内容遍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有的书名很专很冷，每翻阅、抚摸这些新著时，我感到一种由衷的高兴。如今我再次阅读全生的书稿，不禁喜而不寐。近年涌现的诸多新著，它们的质量自然会有参差，但是，于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声在迫近。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个半世纪，我们民族总是“被动挨打”，处于弱势、劣势，于是在人文学界，仰视西方学术，而不能或不敢平视之，遂成了“痼疾”。而近年，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百余年来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理想有可能成为现实。试看今朝，中国语言学人在吮吸自己大地的乳汁，在继承中外的学术遗产，在撰写自己的论著，我们在自主创新、在原始创新，中国语言学有朝一日会不再处于模仿、尾随、等人家的理论来“中国化”的地位。晨曦已现，白昼将临。

以上数语算是我对诸葛亮“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十字的引申吧。

在诸种文体中，散文比较自由，序更自由，“上穷碧落下黄泉”，都可以寻踪；“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可以纵论。所以我就充分利用了这自由，借为全生的新著《晋方言语音史研究》写序的机会，畅谈了我的一些观点，颇感惬意。

2007 年于金陵随园北邻

目 录

序	侯精一 1
异军突起之著、囊括性之著	鲁国尧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晋方言概况	1
第二节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2
第三节 国内外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述评	4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途径及方法	19
第五节 资料准备及应遵循的原则	24
第六节 主要观点	33
第二章 晋方言含义、分片、形成及归属	37
第一节 晋方言的含义	37
第二节 晋方言的分片	39
第三节 晋方言区的形成	40
第四节 晋方言的归属	48
第三章 晋方言声母演变史	56
第一节 鼻音声母的演变	56
第二节 轻唇音声母的演变	70
第三节 舌音声母的演变	79
第四节 齿音声母的演变	85
第五节 古匣母字读[k]、[k']的历史	100
第六节 古全浊声母的演变	102

第七节	齿头音、牙音细音前腭化的历史	116
第八节	舌音与齿音、牙音合流的历史	136
第四章	晋方言韵母演变史	139
第一节	阴声韵的演变	139
第二节	阳声韵的演变	190
第三节	入声韵的演变	233
第四节	[iu]的演变及[y]的产生	243
第五章	晋方言声调演变史	248
第一节	平声调的演变	248
第二节	上声调的演变	254
第三节	去声调的演变	258
第四节	入声调的演变	260
第六章	唐五代、宋西北方音与现代晋方音的比较	264
第一节	声母的比较	264
第二节	韵母的比较	266
第三节	声调的比较	270
第七章	晋方言与官话系统的关系	273
第一节	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	273
第二节	晋方言向外的几次扩散	319
第三节	晋方言所受到的外来影响	327
第八章	晋方言的阴阳对转与紧喉音	332
第一节	晋方言中的阴阳对转	332

第二节 山西汾城方言的紧喉音节·····	340
第九章 结论·····	348
主要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74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晋方言概况

本书所称“晋方言”即当今学界之“晋语”^①，不同于“山西方言”。晋方言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分布于山西省除南部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及河北、河南、内蒙古、陕西 4 个省区临近山西的地区（侯精一，2002）。晋方言区共 174 个县市，面积仅小于官话；使用晋方言的人口约 4500 万，仅次于官话、吴方言，与闽方言、粤方言相当；晋方言区的人以山西省居民为最多。

晋方言目前分作 8 个片：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大同—包头）片、张呼（张家口—呼和浩特）片、邯新（邯郸—新乡）片、志延（志丹—延川）片（见晋方言分片示意图）。并州片是晋方言的核心地区，其次是吕梁片、五台片、志延片，其余是晋方言的边缘地区。山西省南部 20 多个县市今属中原官话区，称汾河片。汾河片在历史上与宋西北方音接近，以后逐渐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汾河片实为晋方言到中原官话的过渡区，尤其与晋方言核心地区并州片有较多共同点，为讨论方便，本书所提“晋方言”，大体包括汾河片。

就现代晋方言而言，它“的确具有相当多的特点”（王福堂，1999），至今保留入声并有喉塞韵尾，某些方言点保持着中古等、呼、韵的分别，等等。这不能不考虑晋方言区地理位置的闭塞，“恒山峙

^①“晋方言”与“晋语”是同义学术名词，本书取“方言”，不取“语”，取“方言”更贴近本义。

其北,大河绕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览其间,左山右河之势自若也,襟塞控原之腾自若也”(清康熙十九年《山西通志》,1681)。与官话区长期相对隔绝是方言保守的重要原因。

此外,晋方言历史上还受到历代外来民族语言的影响,可谓“北杂夷虏”的“深弊”区^①。

第二节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汉语语音史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语语音史,一是汉语各大方言语音史。如果欠缺各大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汉语语音史是不完整的。黄河流域是汉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更是汉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头,黄河流域的方言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晋方言作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的一支古老方言,无论就其形成的历史还是所保留的古代语言成分,在汉语方言发展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秦晋方言很可能是汉代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李升,1993:51)。可以说,晋方言史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方言语音史更是汉语语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晋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大大丰富汉语语音史的内容。此外,晋方言史的研究可能对官话、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大方言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为共同构建完整的汉语史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晋方言史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达 3000 年以上^②。但从语音角度研究晋方言史却有相当的难度,唐之前的晋方音历史,尚有待研

①晋方言中“北杂夷虏”的问题很值得开掘,本书第七章第三节谈晋方言的外来影响有所涉及。

②从公元前 10 世纪晋为武王少子唐叔虞封国始,已达 3000 年之久。

究;唐末以后的有关历史文献显示,晋方言与唐五代时的汉语西北方音接近,汾河片方言与宋代西北方音接近,而与官话系统非同步发展(乔全生,2003a)。对这样一种人口、地理面积、历史和语言特征都堪称强势、颇具特点的方言,学界的注意和研究起步较晚,迄今为止的晋方言研究,其成果多以现代晋方言平面描写为主,历史地探索极少。“晋语的历史研究、古晋语的研究等重要课题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侯精一,1999a)。国外最早描写晋方音的当数20世纪初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国内晋方音的描写研究上世纪30年代起步,80年代开始形成一个热点,论文400余篇,论著多部。对晋方音的历史研究,日本桥本万太郎《晋语诸方言の比较研究》、野村正良《山西诸方言に于ける[明]、[泥]、[娘]、[疑]母の头音》均有所涉及。国内研究以现代晋方音为出发点进而探测晋方音历史特点的有白涤洲《关中方言调查报告》,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山西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及其对音变理论研究的启示》,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陈庆延《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的研究》、《晋语的源与流》、《晋南方言疑为晋语祖源方言说》等。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周祖谟《宋代方音》、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龚煌城《12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晋方音,都为研究晋方音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近年来,学者们从诗词文用韵角度断代地考察某一方音史,对汉语方音区域史和断代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如鲁国尧先生《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1979)、《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1981)等关于宋词用韵的系列文章,又如刘晓南《宋代闽音考》(1999),丁治民《金末道士侯善渊诗词用韵与晋南方言》(2002)等。

汉语北方方音史的断代研究出现于20世纪初,如马伯乐《唐代

长安方音考》(1920),王力《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1927),刘文锦《关中汉代方言之研究》(1929),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1942),藤堂明保《17 世纪的开封方言》(1956),黄淬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1998),储泰松《唐五代关中方言研究》(2000)等,这些论著都侧重于断代地研究某个方言点的历史状况。近 20 年来,以考察某个方言点的历史演变的论文渐多,计有近 50 篇。鲁国尧先生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写就、80 年代发表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尝试用多种方法研究方音演变史,丁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1992,又见 1998)提出综合研究法,为开展其他方音演变史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然而,“晋方言语音史”的提出及其相对完整的晋方音史内容的规划,至今尚未见到。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开发。本作者不揣浅陋,拟致力于晋方言语音史探讨,也许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第三节 国内外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述评

系统地研究晋方音史、断代史的著述,迄今未见到;直接或间接地论及晋方言音韵现象历史发展演变的论述,却屡屡可见。本节择要评述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与山西方音的联系,简述贾存仁《等韵精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涉及的晋方音以及国内学者有关晋方音历史的研究。

一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与晋方音及其基础音

《西儒耳目资》(1957,以下简称《耳目资》)是明末来华的法国传

教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撰写的一部著作,目的是为方便来华传教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和识读汉字。该书于明天启五年(1625)在山西绛县写成,翌年在西安出版。尽管它不是专门研究汉语音韵学的韵书,但它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因为第一次用罗马字母记录明末清初的汉语实际语音音值,所以显得尤为珍贵。正因为它的重要,前后有多位中外语言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意见颇不一致,其焦点集中在《耳目资》所记音的音系基础是明代何地的语音系统。总结起来,有以下四种观点:

1)明末山西方言说。陆志韦(1947)认为《耳目资》反映的是明末的山西方言。王力(1980a)也认为“金尼阁所记的大约是山西音,但也是属于北方话的系统的”。李新魁(1982)说:“金氏此书所记述的,主要是当时的山西方音(编纂时得到山西绛县人韩云的帮助)……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山西语音的实际音值,有很大的作用”。

2)明末汉语官话语音系统说。罗常培认为反映的基本是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明末官话(1930)。杨耐思认为《耳目资》记录的音反映的是明末汉语官话语音系统(1991,1992)。

3)以南京音为基础的明末官话说。鲁国尧先生通过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利玛窦用罗马字注音的4篇文章的分析以及对明代官话音系的考察,认为反映的音系可能是以南京音为基础的明末官话(1985,1994)。持相同见解的还有杨福绵(1995)、曾晓渝(1992)、张卫东(1992)和金熏镐(1996)。

4)明末多个地点的语音系统说。日本藤堂明保(1979)认为《耳目资》同时记录了山西陕西官话和当时的北京官话。

以上哪种观点更接近当时实际,本人学识浅薄,恕不一一评述。由于多数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晋方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反映晋方音已经成为问题的焦点。要研究晋方音史,这个问题绕不过去。

在讨论《耳目资》的记音性质之前,必须搞清是否反映晋方音,多